

# 當前大陸情勢分析

蔡維屏

（本文係本中心主任蔡維屏博士對今年國家建設研究會所作之專題報告——編者。）

最近幾年中，中華民國和中國大陸的鮮明對比是：中華民國在安定中求進步，中國大陸則是在掙扎中找出路。

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的中國大陸和臺灣，同樣的遭受了長期戰爭的破壞，同樣的遭受人口的壓力，耕地的限制，和天然資源的缺乏。但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中華民國在臺灣，政治安定，人權獲得保障，經濟進步，工業起飛，財富分配均衡，社會上呈現着一片和諧。反觀大陸，派系鬭爭無時或已，大大影響農工生產，以致人民衣食，反不如廿年前。

中共政權對人民的壓制，總有失靈的一天；人民的忍受，也總會有忍受不了的一日，當「四人幫」被打倒之時，大陸人民普遍的歡呼慶賀，歡呼禍國殃民的當權派得到懲罰，慶賀盼望已久的自由而舒適生活即將來臨。這就給予中共當權派一個警告：如果不能在短期內給予人民自由而舒適的生活，那麼，他們便也會變成人民的公敵，人民亦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是三十年來的不斷鬭爭，和毛澤東的一意孤行，要將億萬人口從赤窮中解救出來，談何容易。所以我們說，今天的中共的當權派是急於找出路，並且是在掙扎中求出路。我們試以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實況，來探討中共政權如何在掙扎，出路在那裏。

## 一、權力鬭爭繼續升高，政治安定希望渺茫

研究中國大陸的政治動亂，必然要談到中共的內部鬭爭，實質上就是派系鬭爭，鬭爭的最後目的，便是奪取黨的領導權。有

人以爲中共內部鬭爭是以政策路線爲主，這與史實不符。誠然，由於政策路線的分歧而發生爭執甚至爭鬭，是可能的，但路線正確與否的解釋權却操諸當權派，當了權，路線便正確，失了權，便是錯誤。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無盡止的階級鬭爭論，便是他和他以後的中共領導階層用來奪權的工具。

譬如劉少奇在文革期間，被毛澤東奪了權，不僅被指爲修正主義者，而且被判定爲叛徒，內奸。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被打倒，劉少奇便恢復了名譽，所指叛徒、內奸罪名被取消，他的路線也被改判爲正確路線了。鄧小平亦復如此，當其失勢時，大陸各地，到處「批鄧反右」，當其復出當權後，中共便執行名符其實的鄧小平路線。可見權力才是第一，路線實屬其次。

在「四人幫」被打倒之後，中共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強調安定團結，可是從鄧小平復出以後到目前，中共領導階層的權力結構，主要是以鄧小平爲首的文革受害者和以華國鋒、汪東興爲首的文革受益者兩派組成，而以葉劍英爲首的元老派居協調和制衡。但前兩派間的派系鬭爭就始終沒有終止過。從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經過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九年九月的四中全會，和一九八〇年二月的五中全會，鄧派節節獲勝。第一，在毛澤東思想問題上，鄧小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獲得支持，對毛的錯誤也作了進一步的檢討。第二，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初步的結論，指出文革十年的破壞，帶給了人民一場浩劫。第三，增選了文革受害者趙紫陽、彭真等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及趙紫陽、胡耀邦爲政治局常委，增選彭真、陸定一等十二人爲中央委員，使鄧派取得更大優勢。第四，免除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人在黨和政府機構裏的領導地位。第五，爲劉少奇平反。

中共五中全會也決定了在今年年底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時，便要決定華國鋒是否還能保持其黨主席的位置。其次，全會決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章」，顯然這些是當權派要用來作武器整理黨的組織，對文革期間入黨的一千八百萬文革受益者加以整肅。這就是說中共內部的派系鬭爭要繼續，要升高，鄧派不僅要對文革受益者的中央領導階層繼續的鬭，還要擴大到地方和基層幹部。

據白魯恂教授最近（一九八〇年五月間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講演）的分析，在大陸社會中，「關係」，尤其高階層「關係」仍屬異常重要，所謂建立「關係」，便是組成派系的別稱。中共的派系不一定有明顯的組織，亦無一定界線，而係上下層間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尤值注意者，在中共政治制度中，政策不如權力重要，中共內部衝突的基因爲權力，而非其他問題。這和我們的看法是相當接近的。

他認爲目前派系的情勢是這樣的：中央現有三千八百萬黨員，其中一千八百萬係文革期間或文革以後入黨的，他們不希望鄧小平繼續批鬥「四人幫」餘黨而遭株連，這是一個派別的基礎。另一派是在文革期間未被整肅的幹部和黨員，他們學會了在整肅運動中如何自保。這些人也希望停止批鬥。還有一派，那是二百五十萬的解放幹部，大多數雖已解放，但未復職，他們需要在批

園中搶奪文革新貴的職位，因而迫使鄧小平繼續對文革派的鬭爭。換句話說，派系鬭爭將持續下去，那麼，中共所謂爭取「安定團結」，希望愈見渺茫了。

本年六月在臺北召開的第九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中，美國加州大學史卡拉賓諾教授在論文中，分析了中共的貶毛運動，並指出「貶毛」若漫無節制，就會造成意識型態的真空，影響到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同時，一旦四個現代化運動失敗，毛思想將會再度成爲政治鬭爭的工具，用來打擊鄧小平一派及其所執行的政策。這個說法，不僅說明在可見的將來中國大陸的派系鬭爭將繼續，也指出中共的派系鬭爭是以意識型態爲工具，而以奪權爲目的。

## 二、推行四個現代化困難重重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卅年，工農業生產始終落後。就工業說，現有的三十五萬個大中小型企业中，有百分之二十四是虧損的。就農業說，大陸有九億多萬人，其中八億人在鄉村種田，但糧食供不應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草案中，就曾經指出：「農村還有一億幾千萬人口糧不足」。我們分析這種情況的造成，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大眾普遍缺乏工作的意願。這裏我不妨舉出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最早是美國加州大學史卡拉賓諾教授一九七八年夏訪問大陸歸來以後說，他在這次訪問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人最優良的傳統——勤勞——在大陸上已完全消失了。」美國專欄作家羅勃·諾威克在一九七九年春在大陸訪問獲准前往哈爾濱參觀一家規模很大的工廠，發現百分之七十的設備關閉，只有百分之三十開工。他不經心地誇獎了在廠的工人，說他們勤於工作，支撐了百分之三十的設備照常開工。工人立即反駁說：「誰告訴你我們樂於工作？我們希望這百分之三十也一齊歇業。」

中國大陸工農大眾工作情緒普遍低落，主要是因爲他們從工作中獲得的報酬過低。而農民的收入更差，所以農民比工人更沒有工作意願。中共對於這種情況是很清楚的。所以這幾年它對工人的工資，也作了一些調整。對農民則採取了一些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減免農民一部份捐稅和放寬對農民從事家庭副業的限制等措施。但工資調整的幅度太小，趕不上物價的增長。而廣大農村民衆，從中共增加農民收入各種措施中獲得的有限。因此，中共想要在短期內提高工農大眾的工作情緒，斷難辦到。同時，大陸工農大眾的工作情緒一天不能提高，中國大陸的經濟就一天難以發展。這是中共今天所面對的主要困難問題之一。

去年中共透露，大陸每年中等學校畢業七百餘萬人，但大專院校所能容納的不到三十萬人。過去這許多不能進入大專院校的青年，絕大多數被下放農村和山區從事生產勞動，二十多年來已累積至幾千萬之衆。那些被下放的青年，不能忍受農村艱苦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紛紛潛返城市，造成城市嚴重的失業問題和社會問題。去年二月五日，下放各地返回上海的知識青年聚集一

萬餘人，切斷鐵路，與軍警發生流血衝突，使上海對外鐵路交通中斷達十二小時之久，便是一個顯著的例證。

爲了解決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中共去年計劃安排七百萬人就業，它所採取的辦法就是在城市大量發展屬於集體經濟性質的服務性行業，但大陸城市失業人口不只七百萬之數，而每年都要新增七百萬失業的人，這個問題絕不是中共在短期內所能解決的。所以去年八月中共在北平召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先進代表座談會」，華國鋒仍然強調下放政策必須繼續貫徹下去。依照胡耀邦在座談會上提出的意見，今後大陸城市知識青年就業，要從三個方面安排：一是在大中城市加強輕工業和服務性行業的發展；二是在大城市和農村之間發展小城鎮，以減輕大中城市所受的壓力和農村的負擔；三是繼續上山下鄉，逐步設立知識青年農場或知識青年生產隊。這三項安排，前兩項可使下放青年數目略爲減少，後一項將分散插隊改爲集體農場來緩和青年對下放的反對。但這些計劃，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完成，也並不能使整個問題獲得澈底解決。這是中共今天所面對的主要困難問題之二。

中共除了要安排每年數達七百萬的城市青年就業之外，目前還有一個幹部就業的問題需要解決。大家知道，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一大批所謂冤案、假案、錯案。這些案件現在中共逐一平反。根據今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在一個幹部大會上所作的講話，大陸各地區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已經得到平反的，據不完全统计，總數達到二百九十萬人，沒有立案審查而得到平反的，比這個數字還要大得多。另據隨後中共官方透露，這些獲得平反的人，總數當在七百萬人以上，他們不但要領回在這個時間應領的薪資，還要官復原職，這就使得中共不但在安排他們的工作上感到困難，也使中共在財政上增加了一筆很重的負擔。去年中共財政赤字估計達到美金一百二十億元，因此，今年年初中共下令各級機關的行政費支出比去年實際支出削減百分之三十，這是主要原因之一。這是中共今天所面對的主要困難問題之三。

中共要急於實現四個現代化，對於這一點我們並不懷疑。但擺在面前的困難是如此之多，又如何能在短期內一一克服？因此，中共在一九七八年擬定的一個「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已被擱置。現在打算以三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從事調整。但這樣一來，中共完成四個現代化的時間就更加渺茫了。

### 三、社會危機日趨嚴重

長期的政治動亂和經濟萎縮，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危機。去年大陸各地興起的人權運動和城市治安秩序的敗壞，便足以使大陸社會危機日趨嚴重。

毛澤東獨裁下嚴格控制人民言論和行動的一些極不合理的措施，早已爲人民所痛恨。所以「四人幫」的被整肅曾經大快人心。鄧小平等有鑒於此，認爲酌量放鬆管制，可以收攬人心，從而提高他們的工作情緒。同時在爭取美國好感及引進西方技術的時

候，可以造成一種「民主」的假象。可是沒有想到，那些遭受迫害的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貧苦不堪的農民，和那些甫出監獄一無所有的幹部，乘機展開了一場有聲有色的人權運動。

中國大陸的人權運動，是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去年四月初迅速開展的。在短短的三個月裏，大陸上出現的人權運動的組織，如雨後春筍，它們一方面利用北平西單的「民主牆」，貼出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大字報，另一方面發行了許多地下刊物，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權。其中包括有「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報」、「解冻」、「北京之春」等十餘種。而以魏京生主編的「探索」言論最爲激烈。它曾經提出「民主——第五個現代化」的口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並刊出「二十世紀的巴士底獄——秦城一號監獄」、「功德林」等文，揭露中共的黑暗統治。一時震撼了全世界。結果，鄧小平因爲受不了華汪一派的指責，也恐懼這個運動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便在三月底對人權運動者實施鎮壓。除了禁止那些刊物繼續出版外，並逮捕魏京生等數十人。去年十月，中共將魏京生以反革命及洩露軍事機密兩項罪名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期收「懲一儆百」之效。最近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還決定建議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憲法中規定的「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取消，以免大陸羣衆利用大字報要求民主，爭取人權。但注意大陸情勢發展的中外人士一致判斷，這種具有歷史背景和羣衆支持的民主運動，是不可能被長期壓制下去的。

中共於鎮壓人權運動的同時，從去年十一月開始，又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爲名，對大陸各大中城市的社會治安秩序進行整頓。不斷在大陸各大中城市舉行羣衆「公判大會」，向羣衆公佈各種刑事罪犯所受到的刑事處分，以嚇阻城市犯罪活動的繼續發展。根據大陸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的不完全統計，僅去年十二月份經過羣衆「公判大會」的計有死刑六十八人，其中六十人當場槍決。

中國大陸城市社會治安秩序的敗壞，表現在那些地方呢？對此，北平「人民日報」去年十二月九日曾在一篇社論中加以描述：「最近一個時期，有些地方，特別是一些大中城市，刑事犯罪活動猖獗，社會治安秩序不好，殺人、搶劫、強姦、聚衆械鬥等重大案件又時有發生。一些犯罪分子結成伙團，滋事騷擾，有的竟敢闖進商店、民宅或在公共場所行兇搶劫，摧殘婦女。有的犯罪分子還居然行兇報復檢舉人，圍攻毆打人民警察和治安積極份子，真是囂張已極」。正因爲這樣，中共規定軍隊要協助地方整頓社會治安秩序。

中國大陸城市治安秩序所以如此敗壞，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三方面加以說明。從政治方面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後遺症。因爲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提倡「造反有理」，於是紅衛兵在奪權鬭爭和「破四舊」中就大搞「打、砸、搶」，到後來並演變成大規模的羣衆武鬭，其結果正如中共所說：無政府主義與極端個人主義流行，任何的權威和紀律都遭到蔑視，這種情況反映到社會上來就是各種刑事犯罪案件的大量增加。從經濟方面說，中共三十年的統治並沒有讓大陸人民從貧困中解脫出來。一

般人民仍然過着極貧困的生活。失業現象十分嚴重。一般估計城市失業人口最少在兩千萬人以上。這些人中的一部份爲了生存，只得鋌而走險。從社會方面說，中共承認青少年犯罪在犯罪案件中所佔的比例很高。這是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學校教育，使得在學青少年管教困難，留在城市的青少年難以就業，以及大量下放知識青年潛返城市，無以爲生，不得不依靠偷竊搶劫度日所造成的結果。上述三個因素，都不是中共短期內所能消除的。這就註定了城市治安秩序問題，將是一個長期困擾中共的問題。

#### 四、「信心危機」與今後大陸情勢

以上說明了從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打倒後，到目前的三年八個月裏，中共當權派如何謀求安定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但是，在卅年暴政之餘，妄想從領導階層裏，人人同心協力，達成安定團結的願望，談何容易，要想全國人民，繼續在極度貧困的情況下作苦工，以實現各項建設則更難。

簡單的說，在過去長期鬭爭的局面之下，中共各派系之間，頭頭們與頭頭們之間，無法建立信心，要達成政治安定，唯有藉鬭爭排除異己，造成清一色的局面才行。要想民衆繼續效忠黨，效忠當權派，除非在極短期間內，人民的生活獲得大幅度的改善；否則，飽經憂患的老百姓，不可能對黨、對當權派的所言所行，會有絲毫的信心，這便是大陸最近公開討論的「信心危機」。

我們可以意料到，在今後一年內，鄧小平和華國鋒之間的奪權鬭爭將愈演愈烈。鄧小平聲言要辭去副總理的位置，李先念和陳雲也做了相同的表示。鄧派一面把趙紫陽捧出來，一面宣傳黨、政行政系統要劃分清楚，這分明是要促使華國鋒放棄總理的位臚而由趙紫陽接替。那麼，在今年八月間要召開的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裏，便要產生另一回合的鬭爭，由鄧派向華國鋒攤牌。

不僅如此，鄧還要對偏向華國鋒的一千八百萬於文革期間入黨的黨員進行一次徹底的清洗。這就必然要產生另一次黨內全面性的鬭爭。可見鄧派不僅要把華國鋒架空，而是要造成清一色的局面。如此，則在今年年底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裏，華國鋒能否保住他已被架空的黨主席的位置，都成問題。

鄧小平主張放鬆管制，原係爲爭取民衆的支持，並提高人民的工作意願。沒想到這個嘗試——使大陸有限度的對外開放——却暴露了中國大陸的貧窮、落後、專制、和蔑視人權等等，同時大陸的民衆也體會到：資本主義國家生活自由，科技進步，維護民主，保障人權，使他們更加悲觀失望，尤其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失去了信心，因而引發了歷時四個月的人權運動，也促成了奔向香港的逃亡潮。老百姓認爲領導階層的貶毛運動，和所謂「實踐派」與「凡是派」之爭等，都是領導階層奪權鬭爭的花招；他們更認爲所謂「四化運動」祇是畫餅充饑之類的騙人把戲。因此，吾人認爲在未來的歲月裏，影響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情勢最大的單一因素，便是這「信心危機」。



諸位當中，也許有人曾去過大陸，或許有親友去過大陸，如果他們祇被安排訪問北平、上海和廣州的話，也許會感覺到大陸人民生活已見好轉。原因是看到了由農民們自耕地出產的蔬菜、雞蛋、甚至魚、肉、手工藝品之類，在市區路旁或郊區村鎮中暢銷，同時也看到人民有限的操自由職業如鐘錶修理、皮鞋修補等等。可是，必須要了解：在北平，黨政要員雲集，擁有人民幣，有購買力的人很多；上海和廣州更是大陸上黑市買賣的最大市場。由走私或者自外國入境人員攜帶到大陸的電視機、計算機、收音機、錄音機、手錶等等都在上海、廣州轉手，賣給擁有人民幣的特權階級。因此，祇有在北平、廣州、上海才有生意興隆的蔬菜市場，才見到操自由職業的小販或工匠。如果在內地，人人都沒有足夠的人民幣來維持生活，照顧子女，焉有餘錢到市場去買蔬菜，到黑市買魚肉呢？又何來手錶給工匠修理呢？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十六日

## 五次圍剿戰史 (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外：平寄 美金 四元  
航空 美金 十四元  
國內：新台幣 十四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